

#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

## ——互文性对话探究

李文革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 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 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 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 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 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 其创作的问题作品, 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研究表明, 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 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 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 王统照; 创作与翻译; 互文性对话; 问题小说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4-0076-05

## A Study on the Intertextual Dialogism in Wang Tongzhao's Earl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LI Wen-g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problem novel” writer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the 1920s, Wang Tongzhao is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textual dialogism between his early translated literature (1921~1924) and the problem novels in his earlier writing career from three aspects. He derived the realistic orientation in writing problem novels from his translation of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realistic works. He formed the notion of “love” and “beauty” based on his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agore's and Yeats' works to try to solve the existing social problems. The same relevance can be found between many of his writings and works of other foreign authors. This study shows that Wang Tongzhao's creative themes, genres, arts and so on are all learned from foreign authors or works, which he creatively blended into his writings so as to form his creative uniqueness.

**Key words:** Wang Tongzhao;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 dialogism; problem novels

作为新文学运动中较早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王统照在1921~1924年间的小说创作, 主要是追求人生的“爱”与“美”,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人生和社会问题, 涉及妇女问题、青年爱情问题、反战问题、劳工问题等。写实是他的作品最大特点。他一生的创作经历了印象的写实、哀感的写实和坚实的写实这三个阶段, 分别以《春雨之夜》

阶段, 《霜痕》、《号声》阶段, 《山雨》、《银龙集》阶段作为其创作的标志。本文主要探究王统照早期问题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

—

在1921至1924年间, 王统照除创作了大量文

**收稿日期:** 2014-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研究”(12XZW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文革(1966-), 男, 陕西华县人,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主任,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文化教学。

学作品之外，还译介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最多的是诗歌，其次是小说。从译介对象的选择来看，他偏向于现实主义作品，注重俄罗斯、东欧弱小国家作品的翻译。译作主要有屠格涅夫的《活骸》《农夫》，柴霍甫的《异邦》和《宛可》等。这些作品大多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下层贫苦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反映。

王统照还以论文的形式译介这些国家的作家作品或文坛状况。在《俄罗斯文学的片面》一文里，他译介了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迦尔洵、安特列夫、高尔基、科洛璉珂的作品和写作特色，认为契诃夫的作品，如《戚外》《塞外》等，还有1920年《小说月报》登载的译作《报复》《蜚语》和《戏言》，全是灰色文学，对于俄国生活的感觉，异常的“痛下针砭”，“以失望的呼声，期将来的希望”，而对于世俗之见，尚带有讽刺的意味；迦尔洵反战作品，尤其是《四日》，属于“忧郁的悲愤”的文学，写出作者自己的忧狂的个性来，“在战后万端的失望中，呼出可怜的呼声”；安特列夫的《红笑》，“以疯狂的印象，热烈的反感的发挥，写出战时无人性的残酷生活”；科洛璉珂，与契诃夫、迦尔洵不同，“纯粹是人生痛苦的慰借者，其恻隐悲悯的同情，非常深长”，其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一副自然人类之爱的同情，用极恳切的笔写出，完全是善的希望”；高尔基作品的题材等方面与前几位作家有所不同，“不仅仅是要惊醒人民的迷蒙，而是勇敢的前进的生命”，“以他自然的特别真诚，写出俄罗斯人生活的现状，可以说是俄罗斯散文文学的一个新时代。”王统照非常赞赏俄罗斯这几位文人的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都将真正的悲忧与智慧从心中发出”。而中国的“文以载道”观，视文学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或“弄月吟风，聊以自娱”，“哪里有真正的嗜好与真正的文学上的见解！”<sup>[1]474-476</sup>其隐含的意思是，俄罗斯为人生文学值得中国文学界借鉴和学习。王统照对以前中国文学观的批评，和文学研究会的原则：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高士倭绥略传》（1921）一文里，他认为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全力注重的，也是人类问题”。几乎“全是为平民报不平，而于社会上恶劣、虚伪、偏颇的礼教，法律，制度相搏战”，“都包含有一种社会问题及法律、道德的问题”，且能“用痛快淋漓形容紧致的笔墨，叙述与刻画出来。”

他的作品“渗透在一种人生哲学里，对于不满意的、虚伪的、无人道的生活”，都要讥讽藐视而攻击<sup>[1]361-362</sup>。王统照也从高尔斯华绥对社会问题的攻击和批判中得到许多借鉴，成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小说作家之一。

在《法郎士之死》（1924年10月25日的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纪念法郎士特号）一文里，王统照对于法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郎士的小说《苔依丝》《企鹅岛》《诸神渴了》等进行了译介和评述。

阎奇男（2004）认为，王统照对以上这些为人生文学非常推崇，在翻译和研究这些作家作品中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为人生和为艺术合二为一的文艺观，也就是爱与美的文艺观。这一文艺观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艺术”的主旨相契合。王统照的“问题小说”，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种“爱”与“美”的信条和追求，反映了人的觉醒。在《王统照小说新探》（1982）一文里，杨义对此解释说：“所谓‘爱’，便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所谓‘美’，便是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他们正是在人的价值和理想中探索人的本质”<sup>[2]326</sup>。

在《对于创作者的两种希望》一文里，王统照对当时从事创作的青年提出了两点希望，其一就是“多读西洋的创作”，比如莫泊桑、安特列夫等作家。要求国内作家多学习“西洋文学”，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洋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克服新文学运动初期作品千篇一律“脱离现实的倾向”。他说：试看一样谈两性的小说，我们看莫泊桑是那样分析的精细，那样描写的深入；阿采巴希甫描写得那样热烈，那样的生活之感觉的敏锐，一比较只能写“公园相遇……低头寻思……捶床捣枕……暗自伤情”的简单的爱的生活为如何？一样叙说战争的苦痛，安特列夫的《红笑》写得多么复杂，微细，小人物的忏悔写得多么动人，一比较近来中国文坛上既少实际的经验，又少有研究的非战文学何如？中国新文坛上的作家，经验既少……不能同时获得许多新的经验，而多读一点文理密察，想象丰饶，艺术生动的西洋文学作品，至少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思考力，想象力，使我们可以得到创作的方法<sup>[3]</sup>。

王统照身体力行，从翻译文学中吸收养料，丰富自己的创作。通过对俄罗斯、东欧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促使王统照创作了很多反映中国的现实和人生问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主题上与这些外国作家及作品明显有着互文性对话关系。

## 二

王统照的问题小说,追求“爱”与“美”的理想。这一思想,与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

这一思想的渊源,大概要追溯到周作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一文。其中说到:“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

“我们要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sup>[4]322</sup>。茅盾在《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1921)又说,显克微支的作品有一个“本思想伏着——这就是‘爱’,爱人类的‘爱’,显克微支的思想却又是基督教的思想”<sup>[4]325-326</sup>。王统照翻译屠格涅夫的《活骸》,认为其“若有一种极灵妙而具有柔细的刺激力,打入我的心中”。其中的主人公在孤苦中梦见基督,并愿随基督到天国去,“唱乐园之歌”<sup>[5]</sup>。王统照的“爱”和“美”是交相融的,是一种人类的爱,带几分基督教的博爱性质。这一点,与他接受周作人、茅盾以及自己译介《活骸》是分不开的。王统照1922年发表的小说《微笑》中的嫣然、《十五年后》的那位大学生、以及《一叶》中性格高洁的女护士,都分别在经历了悔过自新、见证了人类的残忍和历尽苦海之后,最后都皈依了基督教或者信仰了上帝。当然,王统照并非基督教徒,他是希望以美和爱的教义取代上帝的教义,用人文主义否定神与君主,带有启蒙主义的因素。

王统照“爱”与“美”思想中的和谐美学观来自于王统照对黑格尔、康德、柏拉图等的译介与研究,尤其是王统照的关于性爱与美紧密相连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相似或结合。王统照认为两性之间的调和力、感性力即是美,而弗洛伊德认为美就是力多比的转移。在《叔本华为哈特曼的美学的见解》(1920)一文里,王统照对叔本华与哈特曼的美学进行了译介与研究。阎奇男在考察后认为,王统照把这两人的美学观点“误读为主、客观互相融合,这种创造性误读对王统照‘爱’与‘美’思想理念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sup>[6]</sup>。

王统照的文艺观也充分地反映在其创作中。在《王统照先生的诗—王统照诗选>代序》(1958)一文里,臧克家认为该诗选第一辑里的二十几篇作品,表现了四个不同的主题。一个是对于“哀鸿遍野”、“榛莽”丛生的人生的痛苦感受和追求。他把

人生形容得像一条可怕的黑暗“狭道”,同时却在希望那“坦荡的光明”的时候<sup>[2]181</sup>。这一点,很明显与俄国作家尤其是高尔基作品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因为高尔基作品追求着“勇敢的前进的生命。”有关人生问题的探求往往表现的很抽象,有的简直是在谈“人生哲理”。这一点,又明显与高尔斯华绥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因为后者在揭露英国黑暗与困苦中“渗透在一种人生哲学里”(当然受当时中国流行的哲理小说的影响)。即便是王统照的风景诗,也往往要把对自然风景的感受和人生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些风景诗的意义更加加深了一层。

王统照“美”与“爱”思想形成,与泰戈尔存在着密切的互文性对话关系。王统照最早译介了《印度诗人葛拜耳之略传与其诗之表象》(1920),《民铎》上发表的《泰戈尔的人格》(1923),长篇论文《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1923),在《文学旬刊》选译了泰戈尔的《葛拜耳诗杂译》(1922)和《园丁集》,推荐了研究泰戈尔最需要的两本书。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王统照与徐志摩作为翻译,曾陪同泰戈尔到济南讲演。这些经历使得王统照透彻了解泰戈尔思想的真谛。学界一致认为,王统照小说中所信奉的“爱”,在人类之爱、母爱和童心之爱这三个方面深得泰戈尔的启迪。在长篇论文《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里,王统照详细论述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与诗歌的关系,认为“思想为诗歌来源”,“伟大的诗歌即为伟大哲学的表象”。他说:“泰戈尔以诗人以哲学家的资格,作‘爱’的宣传,思想的发扬,文字的贡献,其唯一的希望,就是此等‘爱’的光普照到全世界,而且照澈在人人的心中,则有生之物,都可携手飞行于欢乐的自由之中,而世界遂成为如韵律般光明,色泽般美丽与调谐了”<sup>[4]460</sup>。

王统照在早期的诗歌里也歌颂了“爱”与“美”的巨大力量。他创作第一部诗集《童心》(160多首),在主题上、诗行的排列以及在意象的选择上,都深得泰戈尔小诗的神韵。这些诗歌歌颂童心和大自然的美丽与可爱,小诗短小精悍如行云流水,很多主题在探求人生的哲理,很明显与泰戈尔的主题很接近。《童心〈弁言〉》写道:“一个蓦生的游客”,“长跪于自然的野神石象下”,吹着凄婉曼韵的笛声,期待“童心”之魂归来。《童心》诗集中有小诗76首,其格调和泰戈尔的小诗很相近,明显与《园丁集》、《飞鸟集》特别是《吉檀迦利》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飞鸟集》真实细腻地记下了他对大自

然的“爱”和缕缕情思。他唱道：“太阳穿一件朴素的光衣，白云却披上了灿烂的裙裾。”“黑夜呀，我感觉得到你的美了，你的美如一个可爱的妇人，当她把灯灭了的时候。”王统照的《童心集》里的小诗，在歌颂自然，追求爱、美与自由和谐统一方面，与《飞鸟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诗歌创作方法上，王统照也与泰戈尔之间有着互文性对话关系。在《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一文里，王统照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有“创造的‘爱’与人生‘动’的价值”<sup>[1]453</sup>。这是泰戈尔创作诗歌的一个独特个性。王统照的诗歌中也体现了这一主张。他在《小诗七十六首》的第二十二首中写道：“燕子斜飞的来到，静静地小院里，便添了多少动的生机。”在第二十九首中则赞美小草：“小草的绿痕，请你展开吧！不要吝惜了，他们都开拓了田地候你啊。”在王统照的眼里，燕子是爱的信使，能够带来动的生机；小草是爱之音符，能够传播春的温馨。这一例子说明，王统照接受和采纳了泰戈尔“爱”与“动”的方法，将其融汇在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中。

### 三

王统照的创作中，也与爱尔兰诗人叶芝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王统照翻译叶芝的作品主要有：《玛丽亥耐》和《微光集》等诗歌；《战争》《忍心》等小说；有《夏芝思想一斑》《夏芝的生平及其著作》《无道德的梦境》等研究文章；《三个奥薄伦人与邪魔》《古镇》《声音》等小品文。这些译作出版的时间大都在1921~1924年，而王统照文学的“美”与“爱”思想最鲜明的表现在他初期1919~1924年的作品中。如果我们把王统照早期的翻译文学作品与小说创作相对照，不难发现翻译文学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叶芝早期具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倾向，中期即向现实主义发展，表达了对祖国、民族、乡土的热爱，表现对自然的美感和真挚的情怀。王统照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叶芝很相近。他翻译了叶芝的《微光》，认为叶芝追求的“小世界”就是美和爱，而王统照的长诗《独行者之歌》明显地与叶芝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

从艺术手法来说，叶芝早期作品具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倾向，强调作品的哲理性，善于用质感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哲理。在诗歌小说中大量地运用象征手法，使诗歌和小说带有神秘、朦胧色彩。在《小说《忍心》译者前记》里，王统照说，夏芝

的“短篇小说，尤能于平凡的事物内，载着很深长的背影，使人读着，自生幽秘的感想。既不同写实派的纯客观，亦不同浪漫时代的作品，纯为兴奋的激刺。他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鸢远的思想，实是现代作家不易达到的艺术”<sup>[2]331</sup>。在《夏芝的生平及其著作》（1924）一文里，王统照极为赞赏叶芝作品中的象征手法，认为叶芝的《奥厘的漂泊》这篇诗剧，含有丰富的象征色彩，借奥厘独行的超越，表示出灵魂的自由，“其中象征的憧憬，和寄托的深沉，使人联想着而获得灵魂的安慰”。叶芝的《隐秘的蔷薇》《苇丛之风》《和平之蔷薇》《在七树林中》等作品中采用“爱尔兰古代神话的故事，多用草木、器具、景色来象征。”而且，王统照认为象征主义文学具有情的象征和智的象征两种，而叶芝的诗歌“虽都将这二种象征主义包含在内，究竟情的象征的分量多些”<sup>[1]474-476</sup>。

王统照的诸多小说，明显与叶芝的象征手法之间有着互文性对话关系。《春雨之夜》中的小说，重在写意，曾想把思想寄托在作品里面，具体说就是采取了如叶芝那样的“既不同写实派的纯客观，亦不同浪漫时代的作品”的象征手法，在平凡而片段的生活事件中，努力捕捉隐藏在其间的深长背影，传达出一种抽象的人生哲理和幽秘感。用王统照的话来说，便是从“简单的直觉”中，表达“虚幻的愤感”<sup>[2]331</sup>。王统照创作的《月影》，并不直接描写那位爱子夭折而破坏了美满婚姻的中学校长的悲哀，而是通过女友冯惠其去探视和安慰他，在回来的路上和独坐室中，细细品味这个生活断片，悟出“爱是悲的背影”的哲理；《沉思》把女主角琼逸作为“爱”和“美”的象征，官吏则是“功利”和“权势”的化身，画家与记者分别只懂“美”不懂“爱”或只懂“爱”不懂“美”，而成为了“美”或“爱”的象征；《雪后》用雪楼的毁坏，传达一种深长的意蕴：军阀战争毁灭了人间的美和梦；《鞭痕》里用“向日葵上的鞭痕”象征战乱在人们生活中留下的创伤；《一栏之隔》里用“栅栏”象征社会对人生的束缚；《微笑》中用“微笑……终去监禁”象征美好的事物被“囚禁”。这类的象征手法在王统照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从战争题材的创作来看，王统照的作品与叶芝的战争题材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早期的王统照非常关注战争文学。他不仅翻译了叶芝的战争作品《战争》（1923），而且借鉴叶芝的作品和题材创作了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战之罪》（1919）、《雪后》（1921）、《鞭痕》（1921）（下转第85页）

- [7] 谭达人. 幽默与言语幽默[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15.
- [8] (法)柏格森. 笑[M]. 徐继曾,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2.
- [9] 贺陶乐. 《左传》的幽默讽刺艺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85-88.
- [10] 何新文. 《左传》人物论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96.
- [1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741.
- [12] 陈戌国. 春秋左传校注[M]. 长沙:岳麓书社, 2006:401.
- [13] (美)梅尔文·赫利泽. 喜剧技巧[M]. 古丰,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3.
- [14] 薛宝琨. 笑的艺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169.
- [15] (美)保罗·麦吉. 幽默的起源与发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51-52.
- [16] (明)陈懿典. 读左漫笔[M]. 逊敏堂丛书. 宜黄: 黄氏, 清道光咸丰间.
- [17] (奥)弗洛伊德. 谈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235.

(上接第79页)

《战夜的谈话》(1923)等;还发表了论文《文学与战争》(1924)。

王统照的战争题材作品,与俄罗斯作家迦尔询和安特列夫的反战作品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文学的片面》一文里,王统照认为迦尔询的《四日》“记述战争的苦况,深写刻入,令人读之不安,不唯起消极的非战思想,且积极的于兵戈赤血,饥渴伤痛之下,动人道的本怀”,而且“能生出悲悯的同情来……”安特列夫的《红笑》中的主人公不仅“写出战时无人性的惨酷生活,后来竟因为战后归来,成为狂人,其刺激人的感觉,是奋兴的,打击的……”<sup>[1]354-355</sup>。王统照战争小说中也反映出反战和人道主义思想。其第一部战争小说《战之罪》

(1919),写的是一个中年寡妇千里迢迢到白骨嶙峋的战场寻找丈夫的尸骸,着重描写了阴森恐怖的战场。她在极度的精神刺激后成了疯子,最后咯血死去。她临死前一再问老医生:“什么叫做战争”,“战争又是什么”。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思想,很明显与迦尔询和安特列夫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在格调上和《四日》很接近,对战争赤血白骨惨酷场面的刻画深得《四日》的艺术功力;与《红笑》中的主人公一样,中年寡妇精神刺激后成了疯子。《战与爱》(1919)倾诉了青年军官和士兵对战争的厌恶,具有与安特列夫《红笑》类

似的阴冷战争场面的描写,从反面寄托了作者对安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王统照收入《春雨之夜》里的小说《雪后》《鞭痕》等,以象征手法揭示出军阀混战是毁灭人间爱和美的祸根,又明显与安特列夫的象征主义手法有着互文性对话关系。

## 四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①王统照从1919年开始,翻译了诸多俄罗斯、东欧、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的作品,在研究中得到借鉴和启发。其创作的问题小说和诗歌,在主题、创作手法等方面与翻译文学之间明显存在着互文性对话关系。②王统照的问题小说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在许多外国作家作品的综合影响下进行的,尤其与泰戈尔和叶芝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尤为密切。③王统照把人生看作是相伴而生、缺一不可的“爱”与“美”的结合,认为其力量可以创造真美的境界。其创作的问题作品,也希望通过“爱”与“美”两相结合得以解决。④王统照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为我们如何处理好借鉴与创作的关系、如何丰富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益和建设性的启示。

## 参 考 文 献

- [1] 王统照. 王统照文集:第六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 [2] 冯光廉,刘增人. 王统照研究资料[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3] 王统照. 对于创作者的两种希望[N]. 晨报副镌,1923-12-01.
- [4] 贾植芳,等. 文学研究会资料[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5] 王统照. 《活骸》译者前记[J]. 小说月报,1921(号外).
- [6] 朱红素. 爱与美的研究与比较文学结缘[J].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1):34.